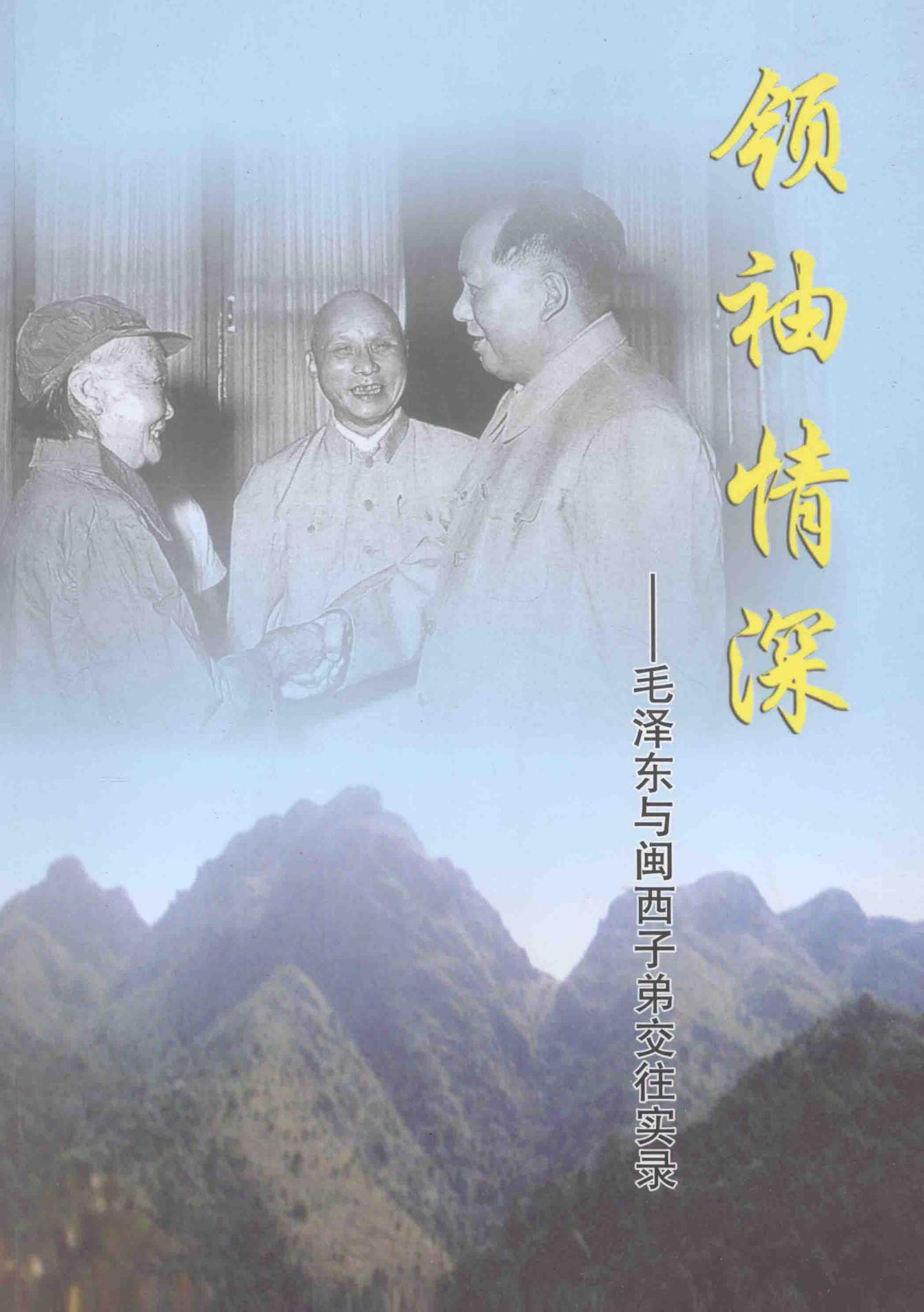


领袖袖情深

——毛泽东与闽西子弟交往实录



领袖情深

——毛泽东与闽西子弟交往实录

编 审：饶作勋 林晓英

主 编：苏俊才

副 主 编：吴升辉

责任编辑：邓建芬 邹文清



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龙岩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

谨以此书献给：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 “才溪

延長120周年

“郷調査”80周年

序 言

王 直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也是毛泽东才溪乡调查 80 周年。作为在毛主席亲自关心下成长起来的、与毛主席有着特殊感情的闽西子弟,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1929 年毛主席率领红四军入闽,我还是一个初涉人世的少年,受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影响和党的教育,我投身工农武装暴动,参加了工农红军,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中央苏区的革命熔炉中很快成长为一名红军指战员。此后,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我逐步成长为一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在我的革命生涯中,有几次亲聆毛主席的教导,对我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与毛主席的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受到毛主席对闽西和闽西人民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厚情谊。比如,毛主席知道我是上杭才溪人后,就自然聊起他在才溪乡调查的情况,详细地询问才溪人民的生活状况,时隔 30 余年而往事历历在目,可见毛主席对才溪人民、对闽西人民的情意之深。

与毛主席交往的闽西子弟中,有不少是我的领导、战友、同乡,他们中包括:与毛泽东有师生情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郭滴人;与毛泽东结下了牢固革命情谊的国务院原副总理邓子恢,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张鼎丞、陈丕显;与毛泽东有深厚战斗情谊的解放军虎将刘亚楼、杨成武;用汗水甚至生命凝成友谊的普通农民陈添裕;还有一生跟随毛泽东左右的戴镜元,为毛泽东保

管稿费的赖祖烈等,这是毛主席与闽西子弟交往的一个代表性的群体。这个群体有一个相同的经历,就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从一个普通的学徒、放牛娃、农民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乃至革命家、军事家,从中折射出毛主席坚定的革命信念、高超的智慧才能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对闽西子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伟人已去,情谊长存。龙岩市党史工作者将闽西人民对毛主席的思念,汇聚成《领袖情深——毛泽东与闽西子弟交往实录》一书,用可读可信的文字将领袖情、挚友谊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毛主席和闽西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尚品格和优良作风将永远鼓舞闽西老区人民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用勤劳和智慧建设美丽闽西,为闽西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加快崛起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目 录

序言	王直(1)
毛泽东:闽西革命的引路人	苏俊才(1)
邓子恢与毛泽东的风雨情结	符维健(35)
握手在凤城	
——毛泽东与张鼎丞的革命情谊	李元健(42)
在领袖的关怀下成长	
——毛泽东与陈丕显	陈杭芹(54)
领袖情 挚友义	
——毛泽东与杨成武	韦祖松(72)
相知在陆地和天空	
——毛泽东与刘亚楼	钟兆云(92)
毛泽东与郭滴人的师生情	符维健(134)
青松翠柏两相知	
——毛泽东与傅柏翠的故事	傅柒生(144)
一位基督徒的坎坷革命路	
——毛泽东与傅连璋	叶介甫 丁 二(167)
毛泽东决定罗元发留守延安	符维健(175)

从“小毛分子”到海军参谋长

——毛泽东与罗舜初……………袁永安 邓建芬(185)

“御前”将军

——毛泽东与刘忠……………邓建芬(197)

阳光哺育塑军魂

——毛泽东与陈仁麒……………符维健(203)

毛泽东信得过的金融管家

——毛泽东与曹菊如……………邓建芬(215)

嘉奖解读“天书”的功臣

——毛泽东与戴镜元……………苏俊才(223)

领袖情深

——毛泽东与李质忠交往片断……………苏俊才(236)

镜头里的乾坤

——毛泽东与童小鹏……………苏俊才(243)

难忘的云中岁月

——毛泽东与何廷一……………钟兆云(251)

毛主席救过他的命

——毛泽东与卢仁灿……………唐关虎(271)

几度聆听领袖教诲

——毛泽东与王直……………丁 二(279)

毛泽东动员他参加红军

——毛泽东与叶青山……………苏俊才(285)

他为毛主席保管稿费

——毛泽东与赖祖烈……………冯 都(290)

苏区出版毛泽东著作第一人

——毛泽东与黄亚光……………汤家庆(294)

长征途中初相识

——毛泽东与黄文佐交往片段……………邓建芬(298)

著名华侨女记者的延安行

——毛泽东与黄薇……………符维健(301)

一次特例的高规格会见

——毛泽东与张龙地……………符维健(308)

毛泽东与乡医吴修山的情谊 …………… 黄卢 建芬(313)

“我忘不了牛牯扑人民”

——毛泽东与农民陈添裕的故事……………邓建芬(317)

后 记 …………… (320)

毛泽东：闽西革命的引路人

苏俊才

从“风云突变”的 1929 年开始，毛泽东前后六次来到闽西。通过在闽西的革命实践活动，毛泽东不仅与闽西人民建立了血肉相连的联系，为闽西人民的革命指引了前进的方向，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闽西人民永远忘不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闽西创下的丰功伟绩。请让我们沿着毛泽东六次进入闽西的足迹，去追述他当年率领红军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艰辛探索和辉煌历程。

转战闽西 制定宏伟蓝图

1929 年 1 月中旬，为了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四军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军长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 3600 余人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准备攻敌后方，以期达到“围魏救赵”之目的。但是，由于下山后一直为强敌紧追，红四军只得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做法，向闽赣边境游击，并于 3 月 11 日挺进到长汀县境内。

红四军转兵向闽西进军，是毛泽东等依据当时形势作出的正确决策。此时，井冈山已失守，而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平和一带，在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下，已建立起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在福建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几支地方军阀部队如盘踞在长汀一带的

郭凤鸣旅、龙岩一带的陈国辉旅等，本来都是土匪，战斗力不强，便于红四军的行动。

郭凤鸣闻知红四军进入长汀四都，慌忙命令团长卢新铭，带一补充团前往堵击。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动出击，将敌击溃，卢新铭补充团被歼过半，余部向长汀城南的长岭寨溃逃。红四军乘胜追至长岭寨下的陂溪村。

在陂溪，毛泽东会见了前来与红四军联络的长汀县委负责人段奋夫，并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听取段奋夫汇报长汀县和郭凤鸣的情况。

毛泽东在聚精会神地听取了段奋夫的汇报后，和朱德、陈毅等交换了一下意见，说：长汀县党组织和群众的基础好，敌人郭凤鸣部战斗力差，应该进攻长岭寨，彻底消灭郭凤鸣。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经研究后决定集中兵力进攻长岭寨，夺取汀州城，消灭郭凤鸣。

3月14日，红四军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毛泽东亲率军部和特务营从左翼迂回敌后，切断敌人退路。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红四军歼敌2000余人，缴枪500余支，击毙旅长郭凤鸣，乘胜占领汀州城，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长汀是闽西八县首府，也是闽赣两省边界最为繁华的中等城市。因此，夺取长汀的胜利，其意义远远超越了战斗本身，它不仅引起福建省军政当局的震动，更主要的是使福建和闽西的党组织看到了闽西发展的前景，重新燃起了他们心中的革命火焰。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进入了长汀城后，通过实际的调查，有了更加切身的感受，并理所当然地影响到他对形势作出新的估量。在长汀城内的辛耕别墅，毛泽东为进一步领导打开闽西赣南的革命斗争新局面和确定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操劳了17个日日夜夜。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把它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因此，进驻长汀城的当天晚上，他就在辛耕别墅查阅了《汀州府志》和《长汀县志》，初步了解了地方社会状况。

3月16日，毛泽东在长汀党组织的帮助下，邀请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教书先生、佃农、游民等各阶层的人，在辛耕别墅内开座谈会，进一步了解了长汀的政治、经济、阶级状况和风俗民情。

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正确地制定出打土豪、筹款子的具体政策和对象，充分发动了群众。他在给中央的文件中高度赞扬说：“闽西赣南的民

众都非常之好，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豪劣绅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红四军还在汀州城内筹得光洋5万余元，解决了给养问题。毛泽东还根据长汀城商业、手工业和文化比较发达，商人和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情况，亲自起草了《告商人和知识分子》文告，这一文告提出保护一般私营工商业，并对大中小商人略加区别，以及争取、欢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政策和出路，发展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规定的关于党对中小商人的正确政策，这对于纠正当时中央领导对城市工商业和小资产阶级的过“左”政策，争取中间阶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汀的信息，自然比赣南山区要灵通得多。在这里，毛泽东确切地获知：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已经决裂，国民党阵营内部的一场大混战已不可避免。毛泽东意识到：国民党军阀的大规模分裂与战争必将暂时放松对于红军的压迫，从而给工农武装割据的创造与发展提供新的机会。

面对这种新的局势，有必要通盘考虑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3月20日，毛泽东在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在赣南、闽西创造工农武装割据的良好条件，并对全国在蒋桂战争爆发的局势之下的有关革命斗争问题，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建议。会后，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向中央报告，提出全国的“一般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进而认为“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地，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特别是这三省交通可达海口，值得引起注意，建议中央以此三地方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的割据。

前委扩大会议从这一发展方向出发，确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并强调“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这是一个重大而又正确的战略决策。它表明，毛泽东已经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的失败与胜利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在农村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其具体的含义，则是清晰地勾划了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蓝图。这是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向“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领导红四军进行了汀州整编。在组织体制上，

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成立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纵队;在领导体制上,将原来的红四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每个纵队设立政治部,内分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政治保卫科。游击区域的群众工作由政治部负责组织实施,在地方赤色政权未成立前,由政治部代行政府的职权。红四军还给每位战士发了一套军服,4元零用费,军容焕然一新。

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红四军在长汀进一步组织群众,帮助整顿地方党组织和建立地方政权,着手进行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部队在汀州城附近进行近距离分兵,分头开展工作。毛泽东指示从红四军调拨20支枪给长汀县赤卫队,还派出军事干部帮助训练。依据东固游击区秘密割据的经验,帮助长汀党组织“在汀州组成了二十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比以前发展二倍”。并于3月下旬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这是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在赣南、闽西建立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

红四军驻汀州期间,毛泽东还指示前委通过长汀县委与上杭、武平、永定、平和等县取得了联系。上杭、龙岩、永定三县的县委书记在上杭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红四军攻克汀州后急剧变化的闽西形势,确定新的工作方针。中共福建省委也对闽西的革命斗争发出了指示。在红四军入闽的影响下,闽西的群众斗争迅速恢复并走向高涨。

3月底,毛泽东获悉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已经转战到达赣南;在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北调,准备投入蒋桂战争。于是,决定按照前委扩大会议预定的计划,利用赣敌后方空虚之机,迅速回师赣南。4月1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依依惜别长汀人民,经古城向瑞金进发。

再度入闽 收拾金瓯一片

5月中旬,蒋桂战争结束,赣南方面的国民党军回防,对红军压力加重,而在闽西方面,盘踞在龙岩的地方军阀陈国辉旅主力却因粤桂战争爆发,又随驻守漳州的国民党新编第一师师长张贞赴广东参战,兵力空虚。此时,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及时地将闽西、闽南敌情的变化和闽西革命斗争现状,写成详细的书面报告,派人火速赶往赣南,面交毛泽东,建议红四军再度入闽,

推动和扩大闽西地区的革命斗争。

5月18日,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再度入闽,赤化闽西各县。

5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瑞金向长汀濯田进发,沿途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到达濯田后,毛泽东顾不上休息,立即在石桥头召开群众大会,亲自宣传发动群众。这时,赣敌李文彬部发觉红军动向,在后面紧追不舍,相隔不到一日的路程,企图围歼红军于汀江西岸。红四军前委决定指挥部队迅速过江,尽快甩开敌人,直下龙岩。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住地濯田“槐盛店”,和朱德联名发出两封急信,派宋裕和先行出发,送交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和闽西地方武装负责人曾省吾、罗瑞卿、傅柏翠等,要他们做好各项策应准备,并约好在连城庙前商讨红军下一步的具体行动计划。

5月20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在长汀水口渡过汀江,彻底甩开赣敌的尾追,挺进闽西腹地,并于第二天下午,经涂坊、南岭、下罗地、新泉,进驻连城县的庙前。当晚,毛泽东、朱德在庙前听取曾省吾、傅柏翠等人的敌情汇报后,决定红四军沿芗园、烂石峡、古田、小池一线,乘敌不备,袭取龙岩。

红军行动神速。5月22日正午,红四军抵达上杭古田,立即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代表前委在会上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提倡实行男女平等。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和红军的帮助下,地方党组织立即举行农民暴动,并成立了古田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邓子恢在上杭接到毛泽东、朱德的信后,也立即召开特委紧急会议,通知各县县委,积极准备发动农民武装暴动,配合红四军的军事行动。一时间,整个闽西造成了四面骚动的局面。

22日晚,红四军到达龙岩小池,毛泽东在驻地“赞生店”主持召开前委军事会议,当即决定:抓住陈国辉主力开赴粤东参战,龙岩城内只有不足五百兵力的有利时机,出其不意,攻下龙岩城,捣毁陈国辉巢穴。

5月23日上午,在闽西党组织配合下,红四军向龙岩守敌发起第一次进攻,歼敌一个营,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取得了首战龙岩城的胜利。

进城后,毛泽东亲自到省立第九中学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说,阐述全国和福建的形势,历数社会弊端,痛斥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他精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号召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道,勇敢地投入革命斗争的洪流,担负起解放劳苦大众的重任。毛泽东的精彩演

讲,像春风吹拂着师生们的心扉,许多学生当场报名参加红军。

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二次入闽的战略意图,并不在于占领一二个县城,而是要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特别是乘陈国辉主力尚未回归之前消灭其留守在闽西的残余部队,进一步开辟闽西的革命局面。因此,红四军在占领龙岩以后却并不留驻城内,即于当天下午撤出,改向邻近的永定进击,并先后占领了永定的坎市、湖雷。

为了使地方武装更有力地配合红四军的行动,撤离龙岩前,毛泽东、朱德批准拨了一、二百支枪给龙岩游击队,并发给随军前来参战的连南农民武装三四十支枪,以加强闽西人民革命武装。在往坎市途中,毛泽东又对邓子恢说:要重视武装建设,尽快建立起一支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军事上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地方红军,这是保证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的基本条件。

5月25日,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二、三纵队挺进永定,在张鼎丞领导的地方武装配合下,胜利攻占了永定县城。毛泽东在县城“赖家祠”住了4天,指导红军分赴永定城乡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歼灭反革命团匪。他在城关南门坝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自己的新政权。他还亲自参与了拆毁城墙的行动,并帮助建立了以张鼎丞为主席的永定县革命委员会。

5月28日,毛泽东在永定得知败逃的残敌又摸回龙岩城后,立即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以第三纵队二打龙岩,引诱陈国辉主力回援,聚而歼之;第一、二纵队分别在永定坎市和龙岩龙门一带,深入发动群众,扩展红色区域。这样,红四军退出永定县城,又再次分兵于6月3日进占龙岩,毛泽东也随即率军部和第二纵队由永定坎市进驻龙门墟。

红四军二次攻克龙岩,使正在广东参加军阀混战的陈国辉坐卧不安,立即率主力,气势汹汹地扑回龙岩援救。毛泽东、朱德获知这一情报,毅然决定红军再度撤离龙岩城,转攻上杭白砂,并于6月7日,将驻守白砂的国民党军卢新铭旅一个团击溃,并消灭其大部,迫使残敌退守上杭城。红四军旋即再改向连城游击。

6月10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经旧县转往连城新泉。红四军深入周围农村,发动了连城南部13乡的农民暴动,帮助建立起连南革命委员会。期间,红四军前委决定将闽西地方工农武装组建成红四军第四纵队。毛泽东十分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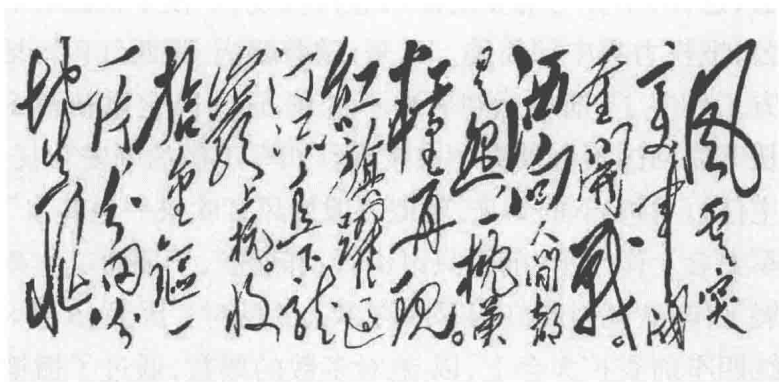
这支红军的队伍建设，先后多次选派得力的政治、军事干部帮助指导训练，并把他们留在纵队任职，使之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劲旅。这支正式红军的建立，不仅大大增强了红四军的力量，而且为将不脱产的赤卫队升编为地方红军，又将地方红军升编为正规红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创建人民军队的理论。

陈国辉率主力不费一枪一弹回到龙岩，果真以为红军已退回赣南，因而在城里举行“庆功祝捷”大会，对红军毫无戒备。这时，毛泽东和朱德又集结红四军，长途奔袭，于6月19日第三次攻占龙岩。毛泽东指挥红军任用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使得陈国辉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这一仗红军共歼敌2000多人，陈国辉旅几乎全军覆灭。经此打击后，侥幸逃脱的陈国辉再也不敢回闽西。6月21日，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龙岩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三打龙岩歼灭陈国辉旅后，闽西境内除留守上杭城内的郭凤鸣残部卢新铭旅外，已无强敌。这就为红四军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赤色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此，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决定在闽西实施“七月分兵”计划，红四军4个纵队赴各地开展工作。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基本扫清了闽西境内的残余反动武装，群众普遍发动，农民暴动和土地革命的烽火燃烧到龙岩、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各县的广大农村，红色区域成片扩大，初步形成了以龙岩大、小池、永定、上杭古田为中心区域的闽西革命根据地，从而基本上实现了1929年3月20日长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制定的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

这年秋天，毛泽东有感于当时的大好革命形势，在闽西写下了《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历经沉浮 革命志向弥坚

红四军自 1929 年初离开井冈山向敌后出击以来,利用国民党爆发蒋桂战争、粤桂战争的时机,在赣南、闽西一带打出了一片新天地。赣南、闽西新局面的出现和红四军的发展,是毛泽东坚持他的建党建军的红色政权理论的初步的实践成果。

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一些新的复杂的问题产生了。这些新问题的产生,是随着红四军的党和部队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发生的新变化而带来的。由于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环境,红四军大部分成员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或来自旧军队,思想和作风上没有经过很好的改造,致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作风,大量地反映到红四军的党和部队中来。由于红四军中一些领导干部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政治工作观念薄弱,影响了对于错误倾向的一致斗争。加上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对形势作了悲观估计,来信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并要朱德、毛泽东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这一错误指示后来在实际中虽没有执行,但在红四军中传开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于是,在红四军党内,以至前敌委员会委员之间,对如何建设红军和根据地等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由此演变成一场大争论。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红四军前委之下要不要设立军委这个问题上。本来前委是红军在游击活动期间的特殊组织,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机构,前委之下设立军委是 1928 年由中央确定的。红四军下井冈山后,每日行军打仗,形势紧张,常要讨论军情和部队行动问题,往往研究同一问题,既要开前委会又要开军委会,这样,军委与前委的活动显得重复,不便于机断,因而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后来,随着赣南、闽西红色区域的逐步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多了,前委感到兼顾不过来,遂又决定重新组织红四军临时军委,由刚从苏联回国不久被党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任书记(同时兼任政治部主任)。刘安恭的到来,就似一股旋风,“吹皱一池春水”。在他主持召开的一次军委会上作出了“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它事的决定,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这就引起红四军内许多人的反对。因而,6 月 8 日,在上杭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上,以绝对多数的票数,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军政